无名氏：《红朝帝师汪道涵》

目录

题记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雷克的一次大陆之行，引起台湾朝野的高度紧张，原因就是此前由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的雷克访华行程中，特别包括了一项赴上海会见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内容。

台湾方面认为，美国总统顾问前往中国大陆，特别要会见汪道涵，似有出卖台湾之嫌。其实，如果仅此汪道涵表面职务分析的话，海协会是为便于海峡两岸有个初级沟通的渠道而建立，所以由海协会会长代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官员谈判台湾问题，根本不合中共政权运作常识。

换言之，当年海协会会长之所以被安排到汪道涵头上，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已经撤消，而曾为江泽民“恩主”的汪道涵因为此时已经在扮演红朝“国师”的角色，所以江泽民必须给汪找一个既不受“取消干部终身制”之后的老干部离退休年龄标准“正部级干部六十五岁封顶”的制度，同时又体面风光的适当位置，而汪道涵在他那一代领导干部中，是公认的“最有贵相”的一位，再加上知识分子出身“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和过去支持外经、外贸工作的经历，故中共高层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对江泽民这一安排有看法，也没有理由反对。

如此说来，雷克这位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仅仅是从外交角度；而汪道涵这位“国师”则是全方位的幕僚角色——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台湾问题不过是汪道涵在各类治国安邦方针政策上帮助江泽民出谋划策的内容之一。

所以，雷克事先计划到上海与汪见面，唯一的原因恰恰不是汪道涵担任海协会会长职务，而是因为汪道涵同他雷克在各自国家领导人面前扮演的角色相同。

当然，独裁政治条件下的“国师”，无论就哪方面提出谏言，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具体到台湾政策，还是中美关系走向，如果不被采纳另说，如果被“确认可行”，也必须由君王本人昭告天下，或者由君王本人向外国来使宣布，“国师”毕竟仅仅是国师，同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邓小平扮演的“红朝慈禧”是不一样的。

党内三大伯乐之一

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庄士顿曾经以他的宫廷经历为原形，撰出一本“紫禁城的黄昏岁月”，如今，中国大陆的共产王朝是否已经步入“黄昏岁月”，人算不如天算，而直到被迫“退居二线”时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序列的汪道涵，反而在迟暮之年实际进入中共决策层，在中南海里消磨自己政治上的黄昏岁月，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的红朝帝师”还要从汪道涵当年所表现出的伯乐慧眼说起。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一步步掌握中共领导权后，一方面推出改革开放和开展经济两杆大旗，一方面在陈云的大力配合下，着手解决共产党政权后继无人的问题。

铲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干部接班梯队”的举措相继推出。

与此同时，又因为否定“文革”而进行的“落实政策”，得以使曾被毛泽东打翻在地的大批老干部“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动员这批老干部把第二次上台后还没有坐热的权利交椅心甘情愿地交给年轻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因为贪权职位而拒不承认自然规律的老干部也不是全部，不如当时的中共电力部部长刘澜涛就非常主动地提出把自己第一把手的位置让给李鹏；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李一民，就再三要求尽快退位，并力主让新提拔的副部长乔石出任部长，正是因为有刘澜涛和李一民的大力举荐和及时让贤，才有了李鹏和乔石坐上中共第二、第三把交椅的今天。

而江泽民之所以有位居李、乔之上的今天，则是得益于他养父江上青的老战友、他本人的老上级汪道涵的长期培养，大力保举和及时让贤，这样说来，汪道涵、刘澜涛、李一民可谓中共元老群体中的三大“伯乐”，个个都是慧眼识珠，分别成就了如今中共接班集体中的一、二、三把手，上述三大“伯乐”中，刘澜涛年龄最长，去世最早，而靠发动红色学运起家的李一民则在去世之前赶上了中共镇压八九学潮，一年多后便怀着对“共产党也镇压学潮”的百思不得其解，忧忧而死。硕果仅存的汪道涵则被江泽民礼聘为“红朝帝师”，挂名海协会会长，不过是为了让他在长期问政过程中便于公开抛头露面的具体名分，事实上，所谓“对台政策”、“两岸关系”之类问题在汪道涵的问政内容中至多排在二、三档次，他更多的精力实际上是放在为江泽民应付内政的排忧解难方面。

江泽民养父秘汪道涵恩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来自上海滩的江泽民在邓小平亲自指挥的北京戒严部队的严密保护下，以坦克开道，借机枪压阵，逼迫赵紫阳拱手让出总书记交椅，从此开始了中共政权“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时代，中南海的红墙便向汪道涵日夜敞开。

江泽民一九八五年在上海时，是从汪道涵手中接任的上海市长职务，海外报道文章曾经报道过此二人关系的非比寻常，但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他们之间曾经过的上下级和“新老交替”关系，对于二人如何成为忘年之交的细节，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鲜为人知。

无论是刘澜涛之于李鹏、还是李一民之于乔石，其间不过都是前辈提携后进的关系，用共产党的官式语言解释，即所谓的“上下级关系”。而汪道涵之于江泽民，在有所谓“上下级关系”之前，即已有多层的私人关系。

首先是同乡关系，查中共中央关于党内领导人物介绍，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其实，江苏扬州只是江泽民出生的地方，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泽民祖父江石溪早年从安徽老家移居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在此地行医，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子江世俊即江泽民的生身父亲，六子江上青即江泽民的义父。江上青仅比江泽民年长十五岁，少年时代分别在江苏南通和扬州中学读书，十六岁秘密加入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十七岁时因为参加学运曾被当地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干脆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二九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艺大学文学系，成为当地中共地下党里有名的才子。

江上青的夫人名叫王者兰，上海人，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一九三五年她于江上青结婚后，只生两女，长女名江泽玲，次女江泽慧，按照当时的传统习惯，长兄江世俊便将自己次子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为为子。当时江泽民还在读小学的年龄。也正是因为江家是安徽人，所以抗战爆发后，已经有近十年党龄的江上青在扬州地区从事了一段抗日救亡选活动后，即被派往安徽，从事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入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身边，成为专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内秘密职务则是中共“皖东北特派员”，下辖泗县、五河、嘉山等九个县。而此时根据江上青的要求，从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则被充实到这些县里担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为参加中共活动而毅然放弃学业汪道涵，则被江上青委任为他领导下的嘉山县委书记。同时，江上青又说服盛子谨，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的委任状。一九三九年江上青战死之前，短短两年时间即把皖东北地区的地下和公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本人再成为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抗战领袖人物，近几年有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称江上青实际上是中共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评价如此之高，当然同他养子江泽民突然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有直接关系，但也不能否认江上青当年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功不可没的地方抗日领袖。

培养烈士遗孤义不容辞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岁，从到皖东北工作后，便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能力深为佩服，听到江上青战死的消息时，汪道涵曾难过地为江上青修建烈士墓，可见其昔日交往之深。

按照中国过去的封建传统，江泽民既然已经正式过继给本家叔叔，那么在继承祖业方面，他就不再从属自己生父那一支，而是过去的叔父江上青的唯一继承人，所以，江泽民之于江上青、王者兰夫妇，从法统上讲就是儿子与爹娘之间的关系，还不像李鹏之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样，仅仅是义子和养父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这个“养子”是否曾正式“册封”还是一段历史悬案。

所以，江泽民也从来为自己是中共“烈士遗孤”而自豪，中共方面的公开宣传材料也拚命强调这一点似乎是要以此彰头江泽民“红色接班人”的法统地位是与生俱来。

前几年，江泽慧被安排为中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外界有评论认为这完全是中共组织部领导人在拍江泽民马屁。其实，江泽慧之所以有如此政治荣誉，当然与江泽民本人是中共总书记不无关系，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江泽慧本是江上青的亲生女，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江泽慧仅此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组织部敢于这样安排，江泽民本人也要顾虑一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群众议论。

江泽民步入中南海后，海外关于江泽民身世的文章，只要提到王者兰的，几乎都将其说成是江泽民的生母，其实，江泽民的生母叫吴月卿，早已去世，而海外在报道江泽慧时，也往往都把江泽慧说成江泽民生父江世俊的女儿。许多曾经与江泽民的家庭有过走动的人，也都把长期被江泽民侍奉供养的王者兰老太太当成他的生母，所以也难怪海外报刊寡闻。

至于汪道涵，则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怀念和情谊，从五十年代开始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同乡关系加之与其继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直到当年江上青去世之时，江泽民还是少不谙事，与汪道涵也从未谋面，在中共对外公开的江泽民的简历中，他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至一九四九年两年间的经历空白，但有海外报道说，一九四七年七月，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是从报纸上找到一则美国商人在上海开办的“海宁洋行”的招聘广告，前往应试后，美国佬认为他机电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不错，英语表达能力不行。

不过最终还是将他录取了，因为该洋行的动力管理部门实在急需一名懂得这方面业务的职员。

中共进城后，得知在洋行内任职的中国人中，还有一名叫江泽民的曾经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学生地下党员，于是便安排他参与军管会领导的接收工作，不久，洋行下属的工厂改名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江泽民被委任为副总工程师。

另有报道说，一九四九年在中共接收上海的过程中，汪道涵以华东军事委员会工业部长身份主管工厂接收，江泽民则作为从地下党员中挑选的技术人员参加这一工作，向汪道涵自报山门，汪道涵才得知之就是他要找寻的江上青的遗孤，自此，开始了两人的忘年交。

确实如毛泽东、王震等人一贯强调的那样，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是无数共产党烈士的生命换来的。有幸活着看到共产党坐江山的一天并因此而得到论功行赏、封官晋爵者，自然都要把关心和培养烈士遗孤的工作，变成党内不成文的规矩，李鹏和邹家华等人的成长过程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同样道理，自汪道涵与江泽民见面时，无论从“党性”出发，还是从人性角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都迫使他要对这位烈士遗孤倍加关照。

共同经历建立共同语言

如果说汪道涵对江泽民最初的关照还只是建立在这种“阶级感情”的基础上，那么令汪道涵与江泽民成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除了江泽民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对汪道涵的尊重之外，两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经历也是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共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汪道涵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参加中共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比汪道涵小十一岁的江泽民经汪道涵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支部秘密接收为党员，日后两人谈论起这段经历，江泽民曾谦虚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辈的后应，令汪道涵更加感觉与自己的这位小学弟简直就是“相见恨晚”，阶级亲情之外，又增加了一层难得的缘分。

五十年代初，大批中共华东系统的干部被充实到北京中央政府，汪道涵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则被安排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的直属机构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科长。当时，汪道涵有心带江泽民一同赴京工作，因为王者兰身边需要有亲人照顾，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王者兰出身上海名门闺秀，能诗擅文，其夫江上青战死后，曾亲做七律悼亡诗一首，令参加追悼仪式的汪道涵等人感动至极，其中“十年壮志山河动，一片丹心日月明”堪为佳句，而“誓抚遗孤承素志，尽除奸顽报深情”两句，更是道出了王者兰作为烈士遗孀对尽心抚育江泽民和他两个姐姐的责任感，此后，王者兰果然终身未有改嫁。

一九五五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奉命兴建大陆汽车工业时，抽调一批技术力量到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在汪道涵的特别关照下，江泽民名列第一批赴苏实习生名单，一年后，江泽民完成学业回国，无奈他所学的专业当时只有在东北长春开始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才能因才施用，无法在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不久又升任动力分厂厂长。

大陆第一汽车 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郊，不但天寒地冻的气候令江泽民这位江南才子难以忍受，当时大陆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供应粮”又是以高粱米、玉米面和大碴子（破碎了的玉米粒，大陆东北人用此煮食稀饭）为主，江泽民这位自幼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更是无福消受，时间一长，得了胃病，只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诉苦。

汪道涵那里除了江泽民个人的身体原因，同时也考虑到了一直留在上海的王者兰也确实需要儿子回到身边照顾，于是仅以烈士遗孀不能怠慢这一理由，江泽民便于一九六二年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上海，进入一机部上海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副局级干部）。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人都有记忆，当时全国实行“支援三线”，无论原居内地，沿海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都要高唱“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被调往东北、西南等地区，而要想被调回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就是因为留住大城市的原因，往往是夫妻双方有一人被调到艰苦地区后，另一方宁可长期“两地分居”，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也不愿跟对方前往，为此，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而当时江泽民居然能从一汽调回上海，对汪道涵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患难见真情成忘年之交

“文革”初期，江泽民已经从上海调往武汉市，但仍没有脱离汪道涵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担任该部在武汉的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虽然小受政治“冲击”，但一顶“烈士遗孤”的保护伞，使得造反派不敢过分对他为难，不久，他便被调进北京，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两年后又升任局长。

而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却一度十分落魄，虽然后来也被“解放”出来分配工作，但长时间家庭经济情况不好，虽说“文革”前即已成为副部级干部，但因“文革”中断而后又恢复的高级干部“特殊供应”，当时在北京也只有正部级干部才能享受，所以，汪道涵的家里长时间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享受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最难堪的是每月一人一斤肉票，买了猪肉就买不了牛肉，买肉解馋就不能再买鸡蛋。

如今已经官居中共国家副主席，在中共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里排名第八的“无党派人士”荣毅仁，说起来在“文革”前即已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中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但“文革”中虽有周恩来偶然关照，竟然也抽不上高级香烟，幸而有当时被毛泽东留用的王震即使照顾，将自己的“特供”香烟每月分出一部分，令儿子送到荣府，八十年代初，荣毅仁筹建中信公司之始，王震的儿子王军便可以军人加商人的双重身份进入中信，后来干脆连王震的另一个儿子王兵也拉了进去，都是因为王震与荣毅仁曾有患难之交，王震去世后，荣毅仁曾亲自撰写并公开发表怀念文章，赞扬王震对“党外人士”是如何厚待！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是因为“文革”中同情汪道涵的生活境遇而与汪氏进一步成为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初，江泽民因为沾了从事“外事工作”的便宜，一度担任专家组组长，被派驻罗马尼亚，虽然当时只是个行政十五级干部，比汪道涵低了六级，但实际生活待遇反而比汪道涵要好得多，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后，江泽民立刻赶到汪道涵家，送上从罗国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如果谁家能够得到一套罗马尼亚家具，必定会招来街坊邻里的羡慕和妒忌的眼光，在此基础上退后十年，来自罗马尼亚的奶粉和糖果，就更不是一般意义的礼品了。

为江泽民开道牺牲

公道地说，江泽民当时如此行事，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感情，没有想到过以此为日后升迁铺路搭桥，但汪道涵却是因此患难情谊，对江泽民更为器重，再次出山后，自然一有机会，便大力举荐，自此，两人的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

“文革”后期，时任中共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将汪道涵调到身边当副部长。

方毅比汪道涵小一岁，但参加中共的时间却较汪道涵早两年，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方毅便一直与汪道涵在安徽一带共事，其中有六、七年时间，方是汪的直接上级，直到中共建政前夕才各奔东西。

说起来，方毅同江泽民也有一段间接的历史关系，抗战开始后，方毅从鄂东地区奉命调往皖东地区，接替的就是江上青的未竟事业，巩固壮大了当地的中共新四军根据地。

方毅是中共领导层中的才子之一，平时喜好舞文弄墨，汪道涵则是党内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干部，平时嗜书如命，社交广泛，两人平时惺惺相惜，既是多年的上下级，又是共同语言颇为广泛的私人朋友。

“文革”结束之后，方毅授命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现任对外联络部部长陈慕华是延安女八路出身，年龄还比汪道涵小六岁，自然令汪氏感觉十分压抑，好在此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授命负责全国对外开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才令汪氏柳暗花明，谷牧在中共建政前，也是华东局系统出身，曾担任汪道涵的间接领导，中共建政后，谷牧长期任国家基建委、国家经委担任负责工作，与汽车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汪道涵多有工作接触，一直对他比较欣赏。

与方毅相比，谷牧是修养更上一层楼的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才子之一，琴棋书画样样喜好。

整个毛泽东时代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从来都是要夹起尾巴做人的，被人称得上知识渊博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工业干部路线”，所以对国务院系统的知识分子干部，都不敢大胆启用，到了邓小平时代，才真正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而这便是方毅、谷牧、汪道涵结成私交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谷牧亲自兼任两个机构的主任和党组书记职务，立刻调汪道涵担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此，汪道涵升为正部级。

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专门发出一纸《关于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的通知》，规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以及对外组织合作的方针、政治、条例、规章，研究总结经验，改革有关管理体制，会同国家计委审议的制定全国进出口、技术引进、经济合作、外汇收支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检查监督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采取有利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定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审批合营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工作，审议中国与外国政

府间的长期经济合作或长期贸易协定、协议等等。

通知中还要求：这两个委员会极其党组，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负责管理当时国务院的相关部级机构，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总而言之，所有与对外开放有关的事项，都由这两个委员会统揽，可见其职权之大，权限之宽。

而汪道涵进入这两个委员会之后，立刻帮助谷牧招兵买马，首先推荐的任务自然是已经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有过几年掌管外事工作经验的江泽民。

一九八零年，已经在中央一步步架空了华国锋的邓小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领导人彭冲对华国锋、汪东兴与"两个凡是"的政策跟得太紧，将他调到北京，委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虚职，于当年四月任命陈国栋接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当年十月任命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长职务，但因为还需要市人大会议履行一项人民代表"决定"的手续，故汪道涵正式上任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此时，汪道涵已经正式完成了对江泽民的保荐，汪氏离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同时，江泽民被任命为副主任兼秘书长，也就是说，江泽民从正局级到副部级这一最关键的关卡，便是由文化的帮助他顺利跳过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将江泽民任职的两个委员会以及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等机构合并成为一个对外经济贸易部，江汉志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次年，时任电子部部长张挺下台，专门负责考察副部级以上干部的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及时向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举荐由江泽民接任这一职务，而李锐对江泽民的好感，又是汪道涵多多美言的结果。

当然，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即江泽民和汪道涵当时所合作的工作，正好是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后才正式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被汪道涵拉进国务院下属的外资和进出口管理部门，与江泽民原来担任的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局长职务相比，绝对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多、更容易引起中共高层和中共元老注意的机会。

到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江泽民当选中央委员为止，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汪道涵，汪道涵因为年龄的原因，十二大上没有被安排中央委员职位，从此也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熟悉这段内情的人士认为，当年汪道涵为举荐江泽民，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前文已经提到当时同汪道涵同样表现出这种"主动荐贤"精神的中共老资格部长级干部中，还有刘澜涛、和李一民，巧合的是，刘澜涛、李一民和汪道涵都是因为"文革"的耽误而一生没有出任过一届中央委员（刘澜涛只当过一届候补中委）。

接上海市府非江泽民不可

汪道涵一九八二年没有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自然意味着他在上海市的职务也已经是过度性质，一九八五年换届选举之时，汪道涵再次推荐由江泽民接替自己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职务，虽说当时的胡耀邦、赵紫阳及众位中共元老对此安排并非意见高度一致，但没有人不认为汪道涵的这种举荐是出以公心，所以江泽民再次接替汪道涵的班也就顺理成章，当年刘澜涛、李一民推荐李鹏、乔石分别出任国务院电力工业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时，同样是这种情况，推荐人自己甘愿退居的“高风亮节”举动本身，使得还想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多呆一段时间的众多元老们对他们举荐的人选无法挑剔，也不好意思再挑剔。

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汪道涵与陈国栋等人在工作上的配合谈不上十分默契，当时的那一届上海市委、市府领导班子中，汪道涵是思想、作风最为开放的一个，而陈国栋则受陈云、姚依林等人的影响较深。

据当时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人士回忆，汪道涵在北京工作期间，原配夫人已经去世，后经一机部的老部下从中撮合，与北京外交学院毕业的孙维慧再结良缘，一年后便老来得子，上门祝贺的老朋友曾当面向汪道涵开玩笑：有一位外交学院毕业的贤内助，主管对外经贸工作自然得心应手，为人向来十分和善的汪道涵则跟着开怀大笑。

孙氏的年龄比汪道涵前妻的孩子大小差不了几岁，“文革”前夕夜大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哈尔滨，但她拒绝前往报到，以至长期没有正式工作。

汪道涵因为是国务院系统的老副部长，在北京的居住条件一直比较优越，长期享受着北京东单地区黑芝麻胡同里的一座独立四合院。

到上海后，市府工作人员考虑到这对老夫少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与汪氏前妻的子女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便除了给汪氏按市领导级分配的一套住房之外，另加了一套，陈国栋等人的夫人听说后，心中颇有不满，在市领导有夫人陪同出席的公开场合里，时常抱怨孙维慧不把她们放在眼里，理由是她们这些市领导夫人最晚也是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而孙维慧论级别的话，说她是个科级干部都有“突击提拔”之嫌。

不过，即使陈国栋本人对汪道涵也有看不惯的地方，汪道涵提出从北京调江泽民接任上海市长，也不会引起陈国栋的反对，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的江泽民，无论从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角度，接任上海市长都完全说得过去，而从革命化的角度，更令陈国栋自然回想起当年江上青对他的知遇之恩。

江泽民养父江上青在抗战初期提拔汪道涵时，同时，也把陈国栋安排为皖东地区的长壁县长，汪道涵主动向陈国栋提起这段历史，自然令陈国栋对江泽民产生好感，与汪道涵一起退居二线后，陈国栋出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从“发挥余热”的角度，陈国栋首先希望的是上海市委的新领导班子成员都能够诚心诚意地尊重乃至服从他这位“政治元老”，仅仅基于这层考虑，他陈国栋自然会相信与江泽民的情感讲，肯定会比与芮杏文的感情交流来得容易。

果不其然，芮杏文到上海不久，便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对上海上层元老发难，当时上海有所谓“陈国栋的秘书（经济问题）、胡立教的儿子（流氓犯罪）、汪道涵的房子”一说，芮杏文力

主查办，江泽民则装聋作哑，结果，陈国栋的秘书和胡立教的儿子分别受到司法处理，汪道涵的房子则不了了之。

上海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汪道涵对于江泽民来讲，虽说有点类似邓小平、陈云之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但不同之处在于汪道涵对江泽民基本上是处处支持，全力维护，而不是像邓小平和陈云对胡、赵那样处处牵制，随时提防，另外，除了汪道涵对江泽民的大力提拔之外，江泽民本人在与汪道涵长期交往和共事过程中，各方面都受益非浅。

汪道涵毕竟是中共打江山者中为数不多的正牌大学生出身，相对于为数众多的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来讲，其文化功底和参与中共早期对外开放的领导工作决定了他对新生事物接受较快，其教育程度和长年工作实践决定了其在官场生涯中足智多谋，这一切都令江泽民佩服不已，熟知其中内情者评价说："江泽民无论是当总书记之前还是之后，在汪道涵面前从来是必恭必敬，如果说他对陈国栋（前上海市委书记）之类的元老人物仅仅是敬畏的话，那么对汪道涵则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和佩服。

从市长职位上退下来以后，汪道涵改任国务院上海经济规划区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充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与上海市委、上海市府之间的联络人。

当时，时任国务总理赵紫阳对上海的对外开放非常关心，强调既要加快改造老上海，又要用新思想去设计。据当时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初，赵紫阳的首席智囊鲍彤建议朱嘉明组织一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去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形成一些初步方案，临行前，鲍彤特别叮嘱朱嘉明等人，要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听汪道涵的意见。

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汪道涵，足以被"赵紫阳一伙"视为改革开放的同路人的，事实上汪道涵，也包括江泽民，自被调到谷牧身边具体主持全国对外经贸及对内引进工作之后，就已经成为中共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身体力行者，虽然如今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道路已经再无逆转的卡能，但当年他们这批人所从事的工作，却是顶着党内保守势力的很大压力，许家屯先生曾经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中共保守派原老、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仅仅是个副组长）的李先念，一提到谷牧的名字便反感地说："谷牧是革命派，我不欣赏。"李先念这里所说的"革命派"，其实就是外界所说的"改革派"，就是因为李先念的反对，谷牧没有能够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职务。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汪道涵成为当代帝师，谷牧此时早已"退居二线"，挂名全国政协副主席毕竟也是当年恩主之一，所以江泽民对谷牧还是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专门抽时间上门看望"老领导"。

但是话说回来，江泽民毕竟是在"六四"镇压导致中共高层全面否定赵紫阳之"右倾"路线的大前提先被推到台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仍然在世的陈云、李先念等政治元老视为他们这一派的接班人，所以无论江泽民本人是否情愿，都必须被捆绑在党内改革派对立面的战车上，至少是李先念等人还在世的时候。

从伯乐相马到帝师顺政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至今已经六年，虽然整个共产党政权仍然危机四伏，虽然所谓“邓小平之后”的担心仍然困扰着江泽民及其“第三代领导集体”，但至少应该承认江泽民个人权利的相对稳固已经是今非昔比，而江泽民之所以能够有令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得宜于他选中了一个好师爷汪道涵和一个好管家曾庆红。

江泽民自九四年下半年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对内政策的一系列强势运作行动和对外事物方面的“对台新政”，都是因背后有明白人指点的结果，而所谓的“明白人”虽然不止一个，但汪道涵堪称第一高参，中共内部有人把如今处处影响江泽民的汪道涵比做当年光绪皇帝身边的翁同和，多少有些道理。

查汪道涵的简历，虽然过去主管过对外经济联络工作，但与他同时代的七八十岁的中共老干部中，在外交、外联、对台事物方面比他汪道涵资历深、经验长者，数出一百来个当不成问题，比如前文提到的方毅、谷牧。海协会一经成立，汪道涵立刻获江泽民提名，此前一年，汪道涵被安排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也是江泽民亲自提名。

一九九二年，汪道涵其中担任委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取消，从此包括陈云、薄一波在内的全部党内元老都只剩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头衔，但在此前，江泽民早已经为汪道涵安排好了“发挥余热”的去处，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确实也还有一批元老人物在各种协会担任名誉职务，但汪道涵与他们相比，担任的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职务，简言之，其他元老虽然也有担任名誉职务者，但他们在中组部的花名册上已被注明“离休”二字，而汪道涵却仍然属于“在职领导干部”。

江泽民定期接受汪道涵点播

而江泽民之所以在汪道涵“发挥余热”的问题上如此煞费苦心，除了向汪道涵名正言顺地当自己的军师，汪任海协会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刻有中共内部人士分析道：汪道涵在江泽民背后出谋划策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对台事物方面，江泽民近几年里与汪道涵几乎是定时会面，不知情者奇怪江泽民何以在对台事物上下这么大功夫，熟知内情者则断定江泽民向汪道涵求救的问题其实是包罗万象，甚至也包括如何控制军队，如何掌控武警、公安、情报机构等方面的最敏感，也是最关乎江泽民身家性命的问题。

已经为外界所知的江泽民一九九五年春节抛出的对台新政“江八条”，不但是由汪道涵亲自组织专家班子研讨，而且由江泽民赶在邓小平、陈云等人在世时即发布“对台新政”的主意本身就是汪道涵提出的。

据闻，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汪道涵即给江泽民出主意说，第三代领导集体既然要对内服众，对外彰显与前几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根本区别，关键是要在继续第二代核心的基础上，尽快拿出“自己的东西”，意思是江核心要在理论建树方面和政策制定方面要有超越邓小平的东西。

对照一下“江八条”的实质内容就不难发现，一切的所谓“一国两制构想”只是在文章的帽子里面虚引，而实际内容至少是比过去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关于对台政策的一系列讲话更具体，而且尽力做出对台“宽容”姿态，特别是在统一问题上的“分阶段说”，可谓比邓小平的有关讲话更为现实，事实上也是承认了两岸统一遥遥无期的事实。

曾经在中共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台湾事物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台湾进行私人访问时曾经表示：近年来由于大陆对台系统的人事交替，已出现对台政策诠释上的混乱，这是近来出现大陆对台“动武条件”多种不同版本的主因。

而这种现象给台湾方面带来的困扰是：不懂得中共内部动作常识，对中共内情更无从知晓的台湾记者听见某位口无遮拦的大陆官员口出狂言便大惊小怪，自己吓唬，台湾老百姓经过大陆某些官员和台湾新闻媒体的双重误导，自然不堪其忧，终日心惊肉跳，巴不得无限夸大中共“对台动武”可能性的台湾军方趁乱渔利，抓紧机会让台湾纳税人多花军费而且花得情愿，不懂装懂，自作聪明的台湾政府幕僚在苦于自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情况下，惟恐上峰骂自己饭桶，不得不跟着媒体后面起哄，因为他们至少明白一点，即中共既然是个政治动作完全不透明的铁幕政权，所以他们交给上面的“分析”报告就永远无所谓错——如果报告中的预测内容没有被事实证明，也不是因为自己预测的不准，而是中共政策改弦更张的结果。

其实，台湾方面若在中共对台政策，特别是“动武底线”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避免判断失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随时注意汪道涵的有关讲话内容，这不仅仅是因为汪道涵目前担任着大陆海协会会长一职，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在江泽民身边扮演着“红朝帝师”的角色，担负着出谋划策的功能——无论是两岸关系走向还是中共外交路线，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党内权争…..相比较而言，汪道涵在海协会的主要助手唐树备在诠释中共对台政策方面应该说是实话较多，虚话较少，但是鉴于他本人的副部级地位，他也无法摆脱中共官员在对外发言方面所犯的通病：不敢多说一句，更不敢说错半句。而汪道涵表面虽仅是个正部级干部，“红朝帝师”的实际角色决定了他在对外讲话是已经不再有担心上面怪罪的心理障碍了。

当然，“红朝帝师”再老谋深算、老马识途，也还是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汪道涵为江泽民组织策划的“对台新政”于一九九五年春节正式出笼后，只是在很短时间内起到了拉扯台湾民众，吸引台商踊跃投资大陆的正面效果，接下来便是海峡对岸的李灯辉太不给面子，不但没有善意回应江泽民的“对台新政”，反而“甘愿为美国反华势力当棋子”，跑到美国风光了一圈，因此不但令江泽民饱受党内、军内强硬派的冷嘲热讽，也令汪道涵已经计划好的台湾之行就此作罢。

如果不是李灯辉访美事件，计划分别在北京和台北举行的“汪辜会谈”和“辜汪会谈”内容如今足可以令汪道涵名垂青史。

至于未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是否能够正式会谈，即使能够恢复，届时的汪道涵是否仍然力可从心，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联络华东帮共助江核心

汪道涵在高层人事方面暗助江泽民的最突出举动，莫过于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夕倒杨成功。

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便自作聪明地安排了杨家兄弟代他控制江泽民，但万万没想到江泽民一方面利用汪道涵的华东系统背景，一方面利用自己养父江上青以及曾庆红父亲曾山那一代在中共华东帮元老中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杨尚困、杨白冰兄弟，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夜，营造出一个令邓小平不同意倒杨别无选择的政治气氛。

如果说目前的中共高层存在一个“上海帮”的话，那么无论这个“上海帮”的帮主江泽民还是其大内总管曾庆红，都是中共历史上华东帮香火的延续，而汪道涵一人更是中共历史上华东帮的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汪道涵曾是江泽民养父江上青当年的亲密战友结合直接上级。当年江上青到盛子谨身边，就是时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会宣传部长张劲夫派去的，深得盛氏信任后，江上青不失时机地说服盛氏，必须邀请在皖东北附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进入皖东北合作抗日，盛氏同意后，张爱萍将军协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进入该地区，同时在该地区开辟中共抗日的还有张震担任参谋长的新四军第六支队。

到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前，张劲夫曾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爱萍的最高职务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军衔上将，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到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为止，张劲夫和张爱萍均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张劲夫比汪道涵年长一岁，安徽同乡和长期的华东帮历史渊源，决定了此二人私交甚厚，张氏自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从事财经系统的领导工作，经验丰富，与赵紫阳时代的另一个财政管家姚依林相比，张氏最大的特点是思想不僵化，所以，整个赵紫阳时代里，虽然张劲夫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退居二线，出任中顾委常委，但赵紫阳对他十分器重。

“六四”事件之后，海外突然冒出一批所谓的“赵紫阳前智囊”到处招摇撞骗，其实，当时真正能够称得上“赵紫阳智囊”者只有两人，一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二是实际充当国务院经济问题总顾问的张劲夫，当时，赵紫阳遇到政治难题必与鲍彤商量，遇到经济难题必向张劲夫讨教，凡在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此无不知晓。

当然，无论张劲夫过去与赵紫阳关系多么密切，像他这样的中共元老人物即使对“六四”镇压有不同的看法，“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洗也只会令他淡出政坛，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没有他过去与江上青的那层关系，如果没有汪道涵的居间沟通，他张劲夫就没有可能从赵紫阳的顾问摇身一变，成为江泽民认为可以信赖，可以安排其继续“发挥余热”的“老同志”之一。

一九九零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缅怀江上青烈士》一书，分别收录了张劲夫、张爱萍、张震等人的题词及怀念文章。张劲夫在文章中称赞说：“上青同志的革命激情、敏捷思路和、文学才华，是极为杰出的，他的演讲和著文，都使听者（读者）在心里深处激起波澜，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精英。”

上台之后时刻不忘标榜自己是“烈士子弟”，时刻不忘高喊以“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为己任口号的江泽民，看到张劲夫这段感情充沛的赞扬文字之后，汪道涵为江泽民和张劲夫之间进行的政治疏通自然见效。

中顾委建制正式撤消，虽然一九九四年十二届四中全会正式对外宣布“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利）交接已经完成之后，还能够以领导人身份陪同江泽民出席各类国内活动的政治元老为数有限，而军内元老张爱萍叶飞等人的重新出山，以陪同江泽民出席重要活动的形式表示江泽民军权的稳固，更是汪道涵、曾庆红两人为江泽民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当年江上青遇难时，张爱萍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并发表感人至深的悼文，事发时，江上青夫人王者兰在扬州，听到噩耗后，由江泽民及其生母吴月卿陪同前往江上青的牺牲地拜祭，张爱萍亲率手下八路军、新四军将士迎接烈士一家，这是江泽民与张爱萍第一次见面，当时的江泽民才十三岁，刚刚进入中学读书。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张爱萍与江泽民少有接触，谈不上印象好坏，但“六四”镇压事件却导致张爱萍一度对江泽民不胥一顾。

策划倒杨争取张爱萍

人们还记得，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八九群众抗议运动时，张爱萍曾奋笔疾书，在七位老将军联名致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信中写道："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这七位老将军都是中共五十年代授勋的上将，在当时联名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镇压时，他们都还有所谓的"二线"职务，其中张爱萍、萧克、宋时轮、杨得志四人同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产生的中顾委常委;叶飞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再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聚奎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顾问。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早上，当这封信在长安街上被大学生的宣传车广播后，无数北京市民跟着宣传车走了一程又一程，听了一遍又一遍，场面十分感人。

到本书结稿为止，上述七位上将已有三位作古，他们是宋时轮、杨得志和李聚奎，此三人都比邓小平年龄要小，故北京有人调侃说："邓小平与其他中共元老的长寿比赛，已经比赢了陈云、李先念，剩下的任务除了彭真外，就是当年公开反对他天安门镇压决策的几位上将。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关于当时七个老将军联名致信戒严部队反对军队进城屠杀人民的消息外界曾有详细报导，除了这则重要信息之外，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确实也流传了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新闻"，为此，中共当局在取得"平息反革命动暴乱的伟大胜利"之后，曾经有连篇累版的文章"揭露"八九年、六月间天安门广场的"动乱真相"，举出李鹏被警卫打伤、万里在国外发表声明等一系列政治谣言来说明那场"动乱"的"反革命性质"，但偏偏就对七位老将军的联名信不发一言，可见此事是不但百分之百属实，而且是令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决策层，最为头痛的一场"党内重大政治事件"。

据笔者早在一九九零年得到的消息，当时的邓小平曾经试图原谅这七位老将军，通过杨尚困传旨，希望此七人在"适当场合"做做"自我批评"，结果，杨得志率先被杨尚困说服，在所谓"适当场合"自我解释参加签名的"动机单纯"，只是不希望流血，据说后来邓小平又传旨要求"此事不要再议"。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当时已经很少出门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拖着病体亲自主持中顾委常委会议，当时，连萧克、杨得志、宋时轮三位与张爱萍一起写联名信的老将军都抗拒不住来自陈云和邓小平的压力，违心地到了会场，举手同意中共采取的镇压决策，但张爱萍却拒不到会，以至中共当局在对外宣布中顾委决议时，不得不写了一句"有五位常委因病因事请假"。

但是，因为这则消息画蛇添足地注明了一笔"程子华同志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正确决策"。这等于进一步向外界证明，除了程子华之外的张爱萍等没有到会者，是不拥护所谓的"正确决策的。"

此后，七位老将军中拒不认"错"者中，又以张爱萍和叶飞表现最为坚决，据一位相当知情的军人士透露："六四"镇压后不久，正赶上依次中央军委给已经退役的老军人授勋——即按照他们各自参加中共军队的时间分别授各类名目的勋章，结果，通知张爱萍后，张爱萍拒

绝前往参加仪式，军委按照杨白冰的命令，派出一专门小组到家里送勋章，张爱萍却提前到了北戴河，送勋章小组追到北戴河，张爱萍则返回北京，弄得中央军委十分狼狈。

“六四”镇压过后，外界关注焦点集中在一大批“动、暴乱分子”的命运上面，对七位老将军的行踪和动向基本无人关心，所以，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六四”镇压之后，张爱萍和叶飞即长期拒绝参加中共的各种党、军庆活动，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与江泽民政权拒绝合作的态度。

一九八九年七月底，总政治部通知一批退休老将军参加纪念建军六十二周年座谈会，张爱萍坚持不去，当年九月底，总政治部又情他参加以国防部名义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他再次拒绝，事后海外曾有媒体报导说：张爱萍为此事曾在电话中讥讽道：“平暴”我又没立功，到了会场不成了“反面人物”了！

此细节不知是否有人向张爱萍求证，笔者细查了当年文献，中共官方媒体关于这次建军节的报道中，确实没有张爱萍、叶飞和李聚奎的名字，七位老将军中的杨得志、宋时轮及萧克则有到场。

八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权为了标榜其“六四”镇压后的“国泰民安”，同日又赶上一个建国周年的整数“四十年大庆”，精心排演了一次天安门欢庆活动，当时，但凡还能勉强出门见风的中共元老，包括邓小平、陈云、彭真等，悉数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当时中共媒体发表的照片可以看出，身体最弱的陈云坐在天安门城楼上，必须头戴遮风帽，披厚毛毯，足见在此“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性高于一切的责任感，可张爱萍、叶飞、李聚奎三位在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仍然没有露面。

事后海外曾有报道说：中共有关部门为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四十年大庆”，曾经再三劝说张爱萍上天安门，并强调是邓小平的意思，但张回绝道：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让我上天安门我都敢不去！

此后，张爱萍长期闭门不出，《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而一些大陆文人基于对他这种表现的由衷佩服，便在一些人物传记杂志上为他扬名，虽然不敢涉及“六四”情节，但却突出描述他一生中的反左历史，比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全中国大陆的所有汽笛齐鸣五分钟，人人都在表示哀悼，但惟有张爱萍偏偏在这种时候警告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的教训，应当警惕在中国有人一边说不要“一言堂”，却又一边正在搞“一言堂”。

再比如，五十年代“三面红旗”万万岁的狂热时期，张爱萍把他在甘南平叛，在苏北老区的见闻向中央反映，后又亲自写信给中央书记处，说农村和牧区所有制急剧的变化给农民和牧民带来了灾难。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因为《万言书》痛陈毛泽东好大喜功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被毛泽东斥责为大逆不道，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都随声附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唯张爱萍敢说自己的这位老上级耿直刚正、廉洁奉公。彭德怀被罢官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张爱萍却不声不响地钻进已经失势的彭德怀元帅那冷冷清清的专机里，陪他回到北京。

“文革”初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发表了，张爱萍却“不识时务”，仍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建议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党内整风，中共中央通知他参加“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观礼，他却佯装不知，悄悄去了铁道兵在山东黄河上的演习现场，回京后，发现他工作的总参谋部里一夜之间刷出了五万张打倒他的大字报，于是，他成了“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遭秘密关押后一条腿被打断。

一九七五年复出后，张爱萍重新掌握国防科研部门，为中共运载武器研制再立新功。但是，因为他推崇“唯生产力论”，再次为造反派所不容。七六年初，被江青等人批判的“复辟回潮论”一句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另一句就是张爱萍的“今不如昔”，他二次被打倒后，天天在医院的病房里挨批斗，当时，“四人帮”把邓小平和张爱萍的名字合在一起，称为“邓小平，张二（爱）萍”。

在七六年的四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张爱萍还曾亲自赋诗，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们一唱一和，他在一首“反诗”中写道：（右倾翻案）帽子满天飞，（今不如昔）罪史追，听狂吠，大棒挥，（革命左派）乱世魁，莺歌燕舞瞎鼓吹…..“莺歌燕舞”四字出于当时发表的毛泽东一首夸张“形势大好”的古体词，可见张爱萍当时的确是非常勇敢。

当时张爱萍被软禁在医院里，没有行动自由，于是他就请医护人员从广场上抄回诗做修改，“四五”天安门事件高潮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张爱萍修改过的诗词被医护人员送到广场。

因为有一贯反左，以及长期领导解放军核武器、运载武器研制等方面的历史，张爱萍在中共党内、军内威望很高，“四人帮”倒台后，党内、军内对张爱萍期望很高，很多人认为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职权应该落在他头上，没想到邓小平却把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职务给了比张爱萍大三岁的杨尚昆，张爱萍仅得到一届国防部长的虚衔，与此同时，过去与张爱萍长期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共事的叶飞也被邓小平削去海军司令员的职务，代之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虚位。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张爱萍被迫退居二线，杨尚昆却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继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在此前后，他的胞弟杨白冰也在军内一路高升。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又逼迫出身新四军系统的李先念把国家主席职位让给比他年长两岁的杨尚昆。

如上种种事例，导致了华东系统出身的老干部，老军人对邓小平长期不满，军内在职将领对“杨家将”势力做大的现象更是怨声载道。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爱萍进场之后，全场自动起立报以热烈掌声，老当益壮的张爱萍则还以标准解放军军礼，此情此景，被冷落一旁的会议主持人杨尚昆感触极深，而张爱萍也从来是把对“杨家将”的不满公开表现，有一次张爱萍在北京地区的中共高干俱乐部里打牌，看到杨尚昆出现，起身扭头便走，弄得一些在场的元老夫人都替杨尚昆下不来台。

至于叶飞其人，“六四”镇压之后，张、叶二人所表现出的坚决不合作态度，与其说是基于

对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不买帐，不如说是趁机发泄对大的长期不满更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借“六四”镇压后，对中央领导层的改组，把唯一留在军委领导层内的华东系统老将，长期与“杨家将”合作不愉快的洪学智也逼出军委，把他刚刚当了一年的军委副秘书长职务拿掉，为杨白冰出任军委秘书长开道。

抗战时期，李先念是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爱萍是四师师长（参谋长张震），叶飞是一师师长，洪学智是三师参谋长，如此历史渊源，决定了张、叶等人为洪学智遭贬之事更加愤怒不已。

汪道涵将这些情况向江泽民分析之后，结论自然是只要“杨家将”倒台，江泽民才有可能争取华东系统老军头的支持，起码可以争取到令这批人不给江泽民拆台的结果。

抬举死人安抚在世老军头

汪道涵的策划加上正确后的具体运作，联络到党内、军内广大的反杨力量，不但达到了逼迫邓小平废除“杨家将”的目的，而且还成功推出了被华东帮最信得过的，战争年代长期担任张爱萍参谋长的张震，取代了杨白冰。

到此为止，因为邓小平过去十几年内用人政策上导致的军内矛盾大大缓解，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刘华清即使过去与“杨家将”没有什么矛盾，日后复出只能顺应华东帮打了翻身仗的大趋势了。

“杨家将”的倒台，无疑为张爱萍、叶飞等华东系统的老军头出了一口恶气，但毕竟还有一层当年因反对戒严部队进城因而也冷落了江泽民的原因存在，所以，张、叶二人在十二大召开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公开露面为江泽民捧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汪道涵，比江泽民更明白这两位老军头对在位将领，特别是对张震的幕后影响力非同小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头版上方圈框刊登出张震的署名文章《一部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写在（张爱萍军事文选）出版之际》，立刻被认为是张爱萍仍在发挥其军中影响力的活证据，于是，一直保持与张爱萍密切联系的汪道涵，又适时为江泽民出了一个对老军头在“六四”态度问题上不再追究，和借抬高死人治丧规格安抚活人的主意。

众所周知，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问题上，党、政高层干部中的反对和抵制情绪远不如军方的强烈，特别是一批离、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军头，都认为派军队进城开枪镇压之举，最直接的恶果是“人民子弟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退役的将领们的情绪自然通过各自派系直接影响现役军人，以至“六四”镇压之后，军内论功行赏时无人敢要。

当时鉴于这种形势，已经把持了军队干部任免大权的杨白兵趁机大搞党同伐异，在军内搞得怨声载道，而江泽民成功扳倒“杨家将”后，在军内面临的局面就是：要提拔反对“杨家将”的人，就不能继续以“六四”态度划线；反之就只有继续杨白兵在军内的组织路线，所以，对老军头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不再追究，无疑是帮助江泽民安抚老军头，联络军心，尽量争取在军内站稳脚跟的一个较明智的办法。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新华社接连发布了两名中共退休将军逝世的消息，一位是前解放军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五五年授衔少将），另一位是前海军副司令刘道生（五五年授衔中将）。

本来，中共对内早已就党、政、军离退休干部去世发布消息的规格有明确规定，对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军内离退休干部，去世后分别视其离退休前的级别高低，决定是由新华社发“通稿”还是仅仅由《解放军报》发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本报讯”，所以，李人林和刘道生的死讯上报并非怪事，而怪的是发消息的时间和报纸对消息的处理方式。

李人林死于三月二十四日，发消息时间拖了整整七十天，刘道生死讯的发布时间也拖了二十多天。

另外，像上述二人的生前级别，照惯例其讣告只能刊登在《解放军报》第四版上，但这次却都是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

而从讣告内容看，对此二人的评价都只笼统地说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却没有具体表示他们二人对“六四”镇压是否“坚决反对”——虽然此二人分别是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就是说，一九八九年发生“反革命动暴乱”

时，此二人都还身在其位，当时，凡还“身在其位”的中共元老干部，只要在“六四”镇压问题上表示沉默，立刻会在政治上被冷落。

对此，有知情者透露说：李、刘二人在八九“六四”之后都表现得非常消极，实际上是抗议中共对八九“六四”采取的极端措施，所以，如果他们死在前两年的话，能给他们报出几句简短的消息来就不错了，而这次之所以在他们死后拖了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在“评价”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突然传出“上面”指示，要求在对老同志的身后评价问题上，不要过于纠缠些“思想认识”问题，绕开就是了，而这个“上面”其实就是采纳了汪道涵“锦囊妙计”的军委主席江泽民。

接下来，便赶上曾在“六四”之后与张爱萍、叶飞同步保持不合作态度的李聚奎去世，其治丧规格被突然拔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李聚奎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世后，中共新华社立刻播发了非常详细的生平材料，七月二日又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起灵”和遗体告别仪式，刊登以次日各大报刊的消息报导中，高度评价此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按照中共近些年里才做出的严格治丧规定，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一级领导职务者（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不算），死后的评价中可用“伟大的…..”形容，如陈云、李先念等；曾担任过二级领导职务者，死后的评价中可用“久经考验的…..形容，如王任重、胡乔木等，而李聚奎生前军内最高职务只担任过总后勤部政委，政府内最高职务是石油部部长，党内则连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线后，在中顾委内只能当委员不能当常委。（一九九二年以前中顾委常委相当于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中顾委委员只相当于普通中央委员或正省、部级领导人）。

也就是说，李聚奎生前所享受的待遇只是一个正省、部级，是死后治丧及正式评价的规格则被抬高至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规格，李聚奎生前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以后反而被官升一级。

死人秀助江泽民稳定一方

另外，中共官方有关李聚奎去世的消息中，不但详细介绍了江泽民及其以下的所有中共在职政要都在李聚奎病重期间到医院看望或在其逝世时“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而且特别突出地强调江泽民不但在李聚奎病重时到医院看望，而且因为李聚奎逝世时江泽民不在北京，所以“六月二十七日从外地考察回京后，又亲自打电话对李聚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如果单独看这样一则报导，自然不会有什么惊讶之处，但如果结合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对所有与李聚奎同等地位的其他退役将军的丧事处理，就或强烈感觉到江泽民正在做“死人秀”。

与李聚奎相比，七位反对戒严部队进城的老将军中最先去世的宋时轮待遇最惨，规格最低，气愤不过的张爱萍自己写了文章悼念，七位将军中的第二位去世的杨得志上将因为死在江泽民采纳汪道涵借抬高死人安抚活人的主意之前，所以也是死得凄凄惨惨，治丧冷冷清清。

说起来，李聚奎虽然同杨得志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上将，但李获授上将军衔 时间比杨晚三年，另外，李生前军内最高职务只担任过总后勤部政委，政府内最高职务是石油部部长，党内则连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线后，在中顾委内只能当委员不能当常委，而杨得志生前担任过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多项军内重要职务，党内职务则更是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顾委常委，所以，有心人将李聚奎与杨得志的不同治丧规格稍加比较，不可能不感觉奇怪。

不过，当杨得志的家人及老战友为此愤愤不平，痛感世态炎凉已经一年多后，被江泽民一手提拔的新任总参谋长傅全友却又于九五年底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不知内情者，自然感觉突然，而这幕后的背景是，傅全友正是要配合江泽民在军队进一步站稳脚跟的重要举措，借抬举死人来安抚仍然存活于世，而且对军队仍发生重大影响的一大批老军头，以保证枪杆子绝对听从江泽民的“党”指挥。

所以，李聚奎丧事办过之后，一些老军头都感慨说，杨得志实在是死得早了点；宋时轮更是死的不是时候，如果他们都能够熬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才去世的话，至少不会低于李聚奎的治丧规格和身后评价，也不枉其为共产党戎马一生。

北京政坛也有分析认为，汪道涵适时为江泽民出这种抬举死人安抚活人的主意并被江泽民即使采纳，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客观原因从中促成，那就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为李登辉访美事件引发的中共军方态度强硬的表现。

前文已经分析过，汪道涵为江泽民策划、组织的“对台新政”讲话“江八条”投之以桃后，对岸的李登辉不但没有用汪、江所希望的“善意回报”报之以李，反而于一九九五年年中到美国周游一趟，另汪、江二人一时内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从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因为中共军方的对台恫吓行动一度表现得上得去、下不来，特别是刘华清和迟浩田两人在公开讲话中重提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已经被北京政界认为是公开与“江八条”唱对台——因为一九九五年年初出笼的“江八条”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诉求。

当时还有一则重要信息是，《解放军报》在一段时间内的对台口径，似乎同《人民日报》不太一致，前者的口气，特别是在宣传军队作用方面，要比后者强硬的多。

再者，中共外交系统或发言人那几个月里，也表现得明显跟不上军队的动作，不能不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政治决策系统与军队系统意见不统一的外在表现，而当时江泽民、李鹏等党政领导人的对外讲话，更给外界一种被动地跟着军方强硬态度走的感觉。

一时间，最善于在这种问题上推波助澜的海外报刊，连篇累版的所谓“枪指挥江”的分析报导，令江泽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当上军委主席之后持续三年之久的“邓控制杨、杨指挥枪、枪命令江”的悲惨时日，而当时北京政界已经流传一种更为形象的讽刺说法：“枪杆子打到那里，江核心指到那里”。同时，过去一批在对内镇压问题上主张绥靖政策的老军头，此时在“民族气节”问题上，几乎是个个坚决主张强硬，无论是张爱萍、叶飞，还是杨成武、洪学智….，总之是一大批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销声匿迹，或被迫交出军权的老军头，此段时期都随着两岸敌对关系的日渐升温纷纷出来活动，或参加各种集会，或亲自撰写文章，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一九九五年八月，张爱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署名文章，这是他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第一次在大陆官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政论文章（此前只发表过悼念宋时轮的一篇怀旧文章和悼念李一民的一首短诗）文章中除了追述抗战历史之外，有相当篇幅是论及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包庇、纵容及妄图将台湾变成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批判美国“祸心不退，支持李登辉搞台湾独立”，可见，张爱萍发表此文最直接的目的还是要表达他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强硬态度和立场：“对任何胆敢重蹈覆辙的帝国主义分子，坚决给予有来无回的打！”

而张爱萍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如此强硬，在美“支持台湾独立”问题上如此敏感，自然同他的军中经历有直接关系。

按照资历，张爱萍无疑属于中共开国元勋之列，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次年参加中共红军部队，历任中共红军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新四军三师副师长、解放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和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获授上将军衔，一九八零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张爱萍的一生富有生动的传奇色彩，抗战时期，他以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身份兼任九旅旅长，这支部队被苏北地区的老百姓和国民党兄弟部队称之为“常胜九旅”，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一九四九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兼政委，亲自领导组建了中共解放军海军的第一支舰队，五五年，他担任华东前线总指挥，指挥了中共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诸兵种联合立体作战，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走了江山岛。

在纪念抗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张爱萍还重笔描述了当年江山岛期间与美国人的对抗中说：美国人“派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和我浙闽沿海岛屿建立蒋介石返工大陆的前哨阵地。1955年初，我军在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中，当我们胜利攻占江山岛正向大陈本岛进击时，美第七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数十艘战舰，开到了我浙东海域，对我进行武力威胁，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到了莫斯科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替他向周恩来总理求情，不要进攻大陈列岛，

让其安全撤走，如今，美国野心不退⋯.。

但是，张爱萍在这里没有讲到当年刚刚奉命组建的解放军败走麦城的经历，实际上，国、共两军争夺大陈列岛的所谓“立体之战”早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已开始，当时，解放军的主力舰给击沉，战争爆发后，此地暂时平息战火，五三年四月十一日，解放军又有两艘炮艇被击沉，此后的数次交战，双方均损失严重，七月六日解放军舰队虽然重创国民党海军 106 号军舰，但却付出两艘巡洋舰被击沉的代价，直到当年十一月，解放军海军才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主力舰的海战胜利记录，而这也正是张爱萍对美国和台湾一直存在的历史宿怨，而叶飞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更是耿耿于怀。

在国、共两军作战史上中共自己都承认其最大的一次败仗，正败在武力犯台上，而这次败仗的前线指挥官就是叶飞，一九四九年十月，身为兵团司令的叶飞在指挥部下达攻占他的家乡福建厦门的命令之后，立刻奉命指挥渡海作战，力图一举拿下金门岛，结果三个加强团的近万兵力在抢滩之后被国民党军队如数包围歼灭，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是“以解放军的失利而告终”。

三十年后，中共正视这段历史，在其军史著作中承认“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建制部队受到的最大损失”，而当时负责指挥这场战役的共军最高指挥官叶飞则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征战纪事》中坦承：金门战役因我们的指挥员的失误而遭到重大损失，真是惨痛的教训啊！这一仗，我军损失了近一万人，建制部队的覆灭，在我军历史上是少有的。

事后，叶飞曾写信给毛泽东要处分，但被毛泽东原谅。

接着，中共高层又指示叶飞准备在一九五零年重新攻打金门战役，只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的进入台湾海峡，毛泽东等人才不得不电令叶飞“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

叶飞其人是五五年授衔的上将，此后不久为对台作战需要而专门设立福州军区时，毛泽东亲自决定让已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叶飞同时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政委，从此整个福建地区的党政军第一把手长期由他一人亲掌，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战也是叶飞任第一线指挥。

就是这样一段辉煌的对台作战史，决定了叶飞一提到“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问题，自然会旧恨新仇并发。

总之，无论是张爱萍还是叶飞，当年台湾解放不了虽然不是因为他们无能，但这口怨气憋在心里数十年，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制定经济建设第一，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政策，实际上是希望两岸关系拖到下个世纪再说——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张、叶等人虽对此内心不见得满意，但从务实的角度，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

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曾说：“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可见，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第一，要让台湾“回归”，大前提必须是大陆的经济发展达到长足进步；第二，“实现统一”的“力量”不仅仅指军事上实力，所以，一句“没有这一点不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中共即使要在“统一”问题上诉诸武力，也是在大陆的“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之后。

一九八四年十月邓小平又说：“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的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邓小平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一再强调“军队要忍”，八十年代中期导演的百万大裁军自然也是从这种思维出发，当时张爱萍和叶飞对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如何表态未见公开文章披露，但此二人八十年代以来也确实未获邓小平重用。

从张爱萍、叶飞等人，恐怕还不是出于所谓“山头主义”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文官出身，被张爱萍等人讥讽为“连枪都不会放”的杨家兄弟，最能完全彻底贯彻邓小平军队要忍、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一贯思想。

所以，一批武将出社的老军头因为过去一直对邓小平关于在经济建设第一的情况下“军队要忍”的提法十分不满，认为邓小平的政策是“顾此失彼”，一遇两岸关系紧张，同时也趁邓小平已不能说话或不方便说话的机会，自然要为军方出口气。

当然，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即张爱萍、叶飞等人在步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始终念念不忘如何为“人民子弟兵们”挽回因为“六四”镇压而损失的声誉问题，他们自认为只要重提“要准备打仗”的局面，“人民子弟兵”成为全社会的支柱力量和第一宣传对象，就可以在鼓动起全国各界，党内党外民族主义情绪的前提下，鼓动起解放军官兵“为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的局面下，重振因为经商大潮而涣散了的军队士气，重振解放军在百姓心目中的军威。

上述原因，决定了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访美成行之后，中共军方在职将领的强硬态度，在北京政坛内都被认为离不开张爱萍、叶飞及其他一大批退役老将军的幕后鼓动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江泽民一方面确实也需要靠军方发几枚导弹来警告一下李登辉，同时更需要靠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活跃来支持他这位“三军统帅”在政治局里的“核心”地位有名有实，问题是，毛泽东时代早有前车之鉴，军队系统一旦在政治局内取得发言权和决策参与权后，“枪指挥党”的危险性即会随即升高，他江泽民在既无毛的威望，又无毛的战略的前提下，怎敢放心，让军方继续如现在这样表现下去。

所以，江泽民一方面顶住军方的压力，要求其手下的文宣系统在对台宣传，特别是在对美宣传方面“还是要留有余地”，一方面又在汪道涵、曾庆红等人的帮助下加紧与张爱萍等人的感情联络，千方百计揣摩老军头们的内心世界及他们在对美、对台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真正动机，想方设法对他们进行安抚，平息他们多年来积累的心头之怨和离退休后的心理不平衡，而只要让老军头们“心情舒畅”，进而再对刘华清、迟浩田这批人采取又压又拉的作法，才有可能保证他江核心的宏观“战略部署”不至于完全跟着军方一味强硬的呼声走。

满足老军头的荣誉感

事后看来，汪道涵前面提出的抬高死人安抚活人的主意，以及设法满足老军头们的军人荣誉感的具体办法，已经有事实证明对江泽民稳固其军内领导地位起到了积极效果。

从一九九五年八月开始，在中共报刊上消失多年的张爱萍、叶飞两人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特别是江泽民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接见一批抗日老战士、老模范时，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张爱萍、叶飞不是站在被接见的队伍里，而是被安排在党、军领导人队伍里，一起陪同江泽民接见别人，这在客观上绝对起到了为江泽民捧场的作用。

此信息在海外虽未引起任何震动，但在北京却至少令一批政治异己之士在惊讶之余感觉十分遗憾，自江泽民上台之后，把“六四”平反希望寄予中共内部的政治异己人士，早已经观察到了张爱萍、叶飞与江泽民政权的拒不合作表现，相信待邓小平归西后，这些人肯定会利用军中余威向江泽民政权发难，所以，汪道涵暗助江泽民成功安抚张爱萍、叶飞等人的直接效果，除了大大有助江泽民对军队的控制，还适时打击了一下政治异己分子们对共产党自己平反“六四”的希望之情。

当然，张、叶二人一改坚持七年之久的故意销声匿迹，并不见得此二人在“六四”镇压问题上也已经回心转意，问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政治异己分子，过去把张、叶等人与十四大上被赶下台的“杨家将”归里包堆，一并分析为即将逼迫江泽民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

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张、叶二人同“杨家将”都想到过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借“六四”问题向江泽民发难，也很难想象张、叶二人有与“杨家将”在政治上联手的可能，正如前文分析的，江泽民毕竟已经被认为是党内华东帮香火的延续，而杨家兄弟却是作为华东帮的政治对立面而被赶下台的。

自一九九六年初开始，伴随着当时台海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海外曾传出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涉嫌经济犯罪遭受中共纪检部门审查的新闻，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台湾联合报曾有“来自北京的消息指出：汪道涵可能涉及上海万国证券管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在大陆权利基础相当稳固的汪道涵未来动向倍受注目，据了解，去年年底上海对台工作会议，汪道涵因故在北京未能返沪参加，有消息称系与汪道涵被中纪委检查有关，一位北京观察家分析指出，汪道涵是与当前大陆两大政治势力——上海帮与北京老当权派交情匪浅的重量级人物，显露围绕着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斗争。

“分析指出：汪道涵接受检查的消息明显是冲着江泽民的反腐败斗争而来的，江泽民反腐败同时也为了清除异己，而现在反腐败却反到江的势力范围，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效果。”

这则报导还说：“海协会三年一届，去年已换届，但因中共欲举行二次汪辜会谈，汪道涵因“任务需要”继续留任⋯..。不过，汪道涵是否在中纪委检查后，籍“身体健康”为由，淡出两岸政坛，引起关注。”

一九九六年二月上旬，汪道涵在北京召开的海协会理事会上露面，作出上述报导的海外报刊又紧忙为自己“辟谣”，用“本报上海讯”否定几天前它自己“来自北京的消息”，该报“上

海讯”称：“今年将满八十一岁的汪道涵，在去年十二月圣诞节期间，因胃部不适入院，其后被迫进行胃部局部切除手术，卧榻休息后于近日出院。”“据悉，汪道涵并未因涉入上海证交尉文渊、管金生的案件，暂时也不会因身体原因辞去海协会会长之职，已为江泽民慰留。”

接着，汪道涵自己亲口解释，次前一两个月内他老人家之所以一直没有露面，是因为身体略有小恙，其实，汪道涵这段期间的深居简出，无论是否身体原因，也不大可能是遭受中共纪检部门调查的原因—除非江泽民的党政军“核心”地位已经摇摇欲坠，殊不知汪道涵老大人如今已经贵为红朝帝师，中南海里的“刑部”如果把他也打入“另册”，那真是“太岁头上动土”了。

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三月的汪道涵到一九九六年已过八十一岁高龄，但却依然担任着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职务，没有汪道涵的大力举荐，就没有江泽民在外经部门一步步出人头地和到上海主政的关键经历，自然就没有被选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机会，而主政中南海后，如果没有汪道涵在幕后撑腰和及时点播，哪来江核心？确实颇有几分道理。

汪道涵小传

一九一五年生，安徽省嘉山县人。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后改进上海光华大学学习。

抗战开始后，被中共派往安徽原籍，在江泽民养父江上青领导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县长，淮南区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和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军工部长、华北军区军工部长，辽东行署主任，安徽财政厅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

“文革”结束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八零年十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

一九八五年七月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一九八七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九一年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

一九九三年任大陆海协会会长。